

經文辯讀與比較文學
——巴黎 2013 年國際比較文學大會
圓桌會議紀要

Scriptural Reasoning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view of A Roundtable at the 20th ICLA Congress

張 華

ZHANG Hua

作者簡介

張華，北京語言大學世界宗教研究中心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ZHANG Hua, Professor, Center for Studies of World Religion,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Email: zhanghua@blcu.edu.cn

Abstract

At the 20th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ICLA) Congress at the University of Paris-Sorbonne (July 18 to July 24, 2013),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CCLA), Professor YANG Huilin chaired a roundtable “Scriptural Reasoning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round 12 scholars from universities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gathered and discussed intensively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criptural Reasoning”. Many attendees were from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and it was the first time for them to participate in an ICLA event. The roundtable focused on exploring “scriptural reasoning” specifically at the interstic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religious studies, and especially in the broadening of its traditional scope with Chinese resources, thus aiming to deepen the intercultural, inter-lingu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dimension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further expand the research scop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This review summarizes the main ideas shared and discussed at the roundtable.

Keywords: Scriptural Reasoning, ICLA, inter-disciplina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mparative philosophy

2013 年 7 月 18 日至 24 日，國際比較文學協會（簡稱國際比協）2013 年年會在法國巴黎索邦大學舉行，來自世界各地的 1500 多名代表與會。會議按照常規安排了國際比協委員會會議、大會主題發言、分論壇及圓桌論壇，每個分論壇又按論文題目分為不同小組。在本次大會上，國際比協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楊慧林教授申請了“經文辯讀與比較文學”（Scriptural Reasoning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研究委員會並專門組織了一個跨學科的圓桌會議。本文將回顧此次圓桌會議情況並簡要介紹各位與會學者的思想。

參加“經文辯讀與比較文學”圓桌會議的 12 位學者來自不同的國家和學科領域，但都或多或少參與了“經文辯讀”運動或者在不同場合與楊慧林等中國學者就此對話和交流過，因此巴黎的聚會是這些東西方學者的又一次思想碰撞和交流。這些學者是：英國劍橋大學的大衛·福特（David Ford）教授、倫敦國王大學的奧利弗·戴維斯（Oliver Davies）教授、格拉斯哥大學的大衛·賈思柏（David Jasper）教授、美國耶魯大學的司馬懿（Chloë Starr）教授、拉斐特學院的埃里克·齊奧爾科夫斯基（Eric Ziolkowski）教授、弗吉尼亞大學的彼得·奧克斯（Peter Ochs）教授、日本東京大學的德盛誠（Makoto Tokumori）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的黎子鵬教授、上海師範大學劉耘華教授、北京大學張輝教授、中國人民大學耿幼壯教授和北京語言大學張華教授等。

“經文辯讀”於 1990 年代由西方歐美猶太學者發起，其東方之旅始於 2008 年。是年，楊慧林教授應英國坎特伯雷大主教羅恩·威廉斯（Rowan Williams）邀請參加了在蘭柏宮舉辦的一次學術對話，他與大衛·福特教授的對談讓他開始接觸“經文辯讀”並產生興趣，之後他開始在中國學術界介紹“經文辯讀”，逐步將之作為比較文

學領域內一個跨學科研究理論話題來推介。楊慧林教授自己撰文並申請課題開展“經文辯讀”運動，此外還通過中國人民大學“神學與人文學”暑期班以及與格拉斯哥大學和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共同舉辦的學術研討會等形式與國內外學者切磋“經文辯讀”的含義、範疇及運用方法。“經文辯讀”的發起者彼得·奧克斯教授和大衛·福特教授也先後來中國進行有關“經文辯讀”的講學和對話，推動了這一理論話題的延展和深度，引起了更多宗教學、比較文學和文藝理論領域學者的興趣和重視。因此，巴黎 2013 年國際比較文學大會同意支持楊慧林教授的申請，專門設立了“經文辯讀與比較文學”研究委員會，組織圓桌會議並邀請諸多世界著名大學的哲學家參加，這也是這些哲學家們第一次參加比較文學領域的國際會議。

本次圓桌會議的議題基本上可以分為三組：一組探討“經文辯讀”的含義及研究領域；一組從神學、哲學角度探討“經文辯讀”的意義和可能性；還有一組從具體的文本分析出發來實踐“經文辯讀”。

在第一組論文中，大衛·福特、彼得·奧克斯、楊慧林和耿幼壯從不同角度探討了“何為經文辯讀？”、“經文辯讀在中國是否可能以及如何發展？”、“經文辯讀與比較文學是一種怎樣的關係？”等等議題。大衛·福特教授在其論文《21 世紀的宗教與大學：經文辯讀、比較文學與中國挑戰》（*Religion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criptural Reason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a Chinese Challenge*）中首先回顧了“經文辯讀”的來源及其隨後在美國和歐洲神學與宗教研究界所引發的討論和實踐。根據大衛·福特教授的介紹，“經文辯讀”最早是“文本辯讀”，由 1990 年代早期參加全美宗教研究學會（AAR）年會的一批猶太學者發起。這些

學者在會議期間組成“研經小組”一起讀經，後來開始邀請其他宗教信仰學者一起讀經、辯經。大衛·福特教授很快被這種活動吸引，隨後開始成為這一運動的積極倡導者、參與者和推廣者之一。在這些學者們的推動下，“經文辯讀”的學術會議和活動在歐洲、北美廣泛展開，成為開展宗教間對話的一種方式，但是很長一段時間內參與“經文辯讀”的歐洲和北美學者們集中精力辯讀的主要是《塔納赫》、《聖經》和《古蘭經》。因此，大衛·福特教授特別提到了“經文辯讀”在中國的發展及獨特性，因為楊慧林教授等中國學者的參與帶來了新的局面和氣象。大衛·福特教授指出，楊慧林教授和他的同事們發展了一種通過比較文學進行“經文辯讀”的方法，同時通過分析西方傳教士對中國經典的翻譯，把哲學和神學詮釋學帶入比較文學研究領域。大衛·福特教授認為，“經文辯讀”與比較文學的“聯姻”為神學、宗教學和比較文學等學科的發展均提供了有益的補充。這樣，“經文辯讀”將全球閱讀量最大或最熱銷的文本帶入比較文學，帶給幾億重要人群。這些經文有著被評論和詮釋的悠久而又複雜的傳統，目前仍是世界爭論的熱門話題之一。除此之外，“經文辯讀”也提醒人們注意更多的其他傳統經典文本。大衛·福特教授認為，比較文學至少可以通過三個方面豐富文本間性：一、昇華經文的文學感染力；二、更多視角研究經文對文學的形塑。比如，研究德國作家托馬斯·曼的《約瑟夫和他的兄弟們》與《聖經》和《古蘭經》的關係；三、幫助根植於多元文化與文明傳統中的宗教傳統更好地相互理解。各大宗教都在就文化適應性問題進行論爭，而文學則是這類論爭發生的主要領域。大衛·福特教授認為，比較文學則可以通過“經文辯讀”瞭解宗教對於比較文學理論研究的重要性，可以更好地處理文學研究中的宗教情感。

“經文辯讀”運動奠基人、國際“經文辯讀”協會主席彼得·奧克斯教授為本次會議專門撰寫了萬字長文，題目是《經文辯讀的一種聯繫性（非二元性）符號學》（A Relational (non-binary) Semeiotic

for Scriptural Reasoning)。此文也詳細描述了“經文辯讀”的來源與發展狀況，對“經文辯讀”在中國與比較文學相遇並成為人文學研究領域的一個熱點充滿興趣、肯定和期望。文章再次重申了彼得·奧克斯教授在其他場合多次闡明的“經文辯讀”的實踐與理論關係。他認為，“經文辯讀”以查經小組活動為形式，以實踐為核心，它需要理論特別是詮釋學和符號學理論，也建構理論，但理論必須是服務和滿足於實踐即開展“經文辯讀”活動需求的。“經文辯讀”在學科意義上對學術最好的貢獻應該是“辯讀”(reasoning)。

“辯讀”在一定程度上是雖然是規律性的、邏輯性的，但迄今為止它仍只是關係性符號學而非二進制式的符號學。這一符號學邏輯也許可以在如下實踐中找到資源，如奧古斯丁的禁慾和三位一體經文邏輯、查爾斯·皮爾斯的實用主義邏輯、巴特的文本細讀符號學、《古蘭經》研究中安拉的啟示、猶太教研究中的希伯來《聖經》註釋，以及中國當代比較文學和比較宗教學理論等等。

此次圓桌會議的重要收穫不僅僅在於與會者提交的論文對“經文辯讀”的深入研究有益，更在於與會者在熱烈討論和觀點交鋒時所碰撞的智慧火花。彼得·奧克斯教授在討論時始終堅持的兩點令人印象深刻：1、只有神聖文本也就是宗教文本才可稱為“經文”(Scripture)，而所謂真正的“經文辯讀”一定是對“經文”所進行的辯讀，因為“經文辯讀”運動源自對塔木德、基督教《聖經》和《古蘭經》的辯讀；2、“經文辯讀”實踐必須是“面對面”的查經。就此而言，對非經文進行辯讀可以借鑑“經文辯讀”的形式和方法，但未必是原初意義上的“經文辯讀”。所以，圓桌會議的主題是“經文辯讀與比較文學”而非“經文辯讀中的比較文學”或“比較文學中的經文辯讀”。

楊慧林教授認為，“經文辯讀”來自於對神聖文本的詮釋與解讀，就如同詮釋學來自於針對《聖經》的“經文詮釋”一樣，而今天的詮釋學已遠遠超越只對《聖經》文本的詮釋。基督教傳教士所

譯的中國經典完全可以進入“經文辯讀”的視野，而且“經文辯讀”可以帶來人文學術研究的新方法、新視角，“辯讀”不僅應當成為當今不同宗教間對話的基礎，也應是文學、文化、文明對話與交流的基礎。他說，在此意義上，相比猶太教徒、基督徒或穆斯林，不信仰任何亞伯拉罕傳統宗教的學者也許可以成為一個更好的神學家。

耿幼壯教授提交本次會議的論文題目是《經文辯讀如何進入中國語境及中西之間經文辯讀是否可能》(How Can Scriptural Reasoning Enter in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Is Scriptural Reasoning Possibl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在發言中他追溯了“經文辯讀”在中國發展的情況，再次介紹了這一運動在中國的主要推介者楊慧林教授所做的努力和創造性貢獻，進一步分析了中國傳統的“經學”(Confucian Studies)為“經文辯讀”提供思想和理論資源的可能性以及“經文辯讀”在中國語境下所面臨的問題。正如其論文題目是以問句形式出現一樣，論文再次提出了“什麼是‘經文辯讀’？”以及“經文辯讀如何可能進入中國語境？”等一系列頗具啟發性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視作對彼得·奧克斯教授所堅持的觀點的回應。耿幼壯教授認為，“經文辯讀”進入了具有不同宗教背景和無任何宗教背景的學者的學術視野，它是一種閱讀、思考和詮釋的方式，是某種形式的宗教對話和比較研究，以及某種形式的倫理活動和社會、政治實踐。然而，中國的“經學”研究是以中國特定的經典文本為研究對象的，在中國和西方之間，中國的經典特別是儒家經典能否均可以為“經文辯讀”所接收呢？

二

奧利弗·戴維斯教授為本次會議準備的論文曾幾次變換題目和內容，從最初的《作為一種新神學的經文辯讀》(Scriptural Reasoning

as a New Theology)，到《實踐的大學與全球性自我：中西之間的創造性相遇》(University of the Practice and the Global Self: Creative Encounter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再到最後的《中國與西方的更新詮釋學：走向一種關於修身實踐的理論》(Transformational Hermeneutics in China and the West: towards a Theory of the Practice of Being Human)。從這些不斷變化的題目可以看出，戴維斯教授是從中國和西方對話以及人類可共享的經驗角度來談“經文辯讀”。他的論文對楊慧林教授的詮釋學觀點予以了充分肯定和支持，而且他認為，“經文辯讀”傳入中國，為中國與西方意味深長的相遇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機會。就一般意義的閱讀實踐如何對待和處理差異上來講，今天的“經文辯讀”在很大程度上更加是“中國的”而不是典型的西方的。但是，“經文辯讀”仍然確切地反映了宗教經驗中如何區分和消除差異的西方歷史，中國歷史卻展示了一種通過宗教和解與融合而塑造的身分特徵。奧利弗·戴維斯教授說，中國與西方相遇的核心問題是當今西方歷史中非常具有影響力的二元論是如何被克服的。在一種分享式的閱讀經文的實踐中，通過一種協商性的“聚會”形式，“經文辯讀”能夠正視這一問題。戴維斯教授相信，“經文辯讀”來到中國和在中國的發展，是真正建立全球性詮釋學的最佳時機，通過分享文本閱讀實踐的“經文辯讀”，進而可以讓人們相互分享整個世界。

大衛·賈思柏教授是著名的文學與宗教學教授，早年在格拉斯哥大學創建了宗教與文學研究中心，他的論文《重返神學性的思考》(Returning to Thinking Theologically)在某種程度上也回應了彼得·奧克斯教授的發言。他認為，基督教神學在西方經歷了20世紀的精神創傷和世俗化危機，之後神學思考在全球範圍內尤其是中國得到發展，但今天仍面臨巨大挑戰。在致力於神學思考和研究的同時，我們必須面對和承認神學思考的變化和遷移，面對和承認基督教經文和中

國聖書之間持續和不斷增長的交流，以及這種交流所帶來的“經文辯讀”和“經文詮釋”的新形式。

司馬懿教授的論文《預示的經文辯讀：民國神學家之讀“經”》（*Scripture Reasoning Prefigured: Republican Theologians Reading jing*）非常具體地將“經文辯讀”與中國“經學”研究相結合，對比和分析了兩位民國時期的神學家趙紫宸和吳雷川的讀經和解經方法。她指出，民國時期的神學家們身處戰亂時期，一邊尋找自己作為中國基督徒的身分，一邊在護教和解釋《聖經》的過程中熟練運用自己所掌握的《聖經》詮釋學知識和“經學”思想，採取中國讀者所熟悉的文學表現形式和文體來寫作，達到自己的目的。司馬懿教授通過具體的文本來分析兩位民國早期神學家思想，從中不難看出“經文辯讀”的具體例證。

齊奧爾科夫斯基教授的論文《軸心時代與宗教與文學領域中的比較研究》（*The Axial Age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Religion and Literature*）則以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的“軸心時代”理論為基礎，提出兩方面主要看法：一方面，不論“軸心時代”理論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學術界認同，我們都難以迴避這樣的事實：最初主要由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們倡導的有關“軸心時代”理論的研究，為致力於楊慧林教授所闡釋的“經文辯讀”中跨學科研究的神學、宗教學和文學學者，提供了豐富、寬廣且充滿潛力的探索空間。另一方面，我們與其把自己視作處於所謂的“第二軸心時代”甚至一個“地球村”，倒不如更確切地考慮我們處於一個“比較的時代”，至少，作為從跨文化視角面對和思考宗教和文學的人文學者應當如此。中國學者們的“經文辯讀”實踐提供了一個思路，為跨學科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式。

三

德盛誠教授的論文《一個文本如何實現本土化：日本古代作品及其近代闡釋》(What Makes a Text Indigenous? A Heterogeneous Work from Ancient Japan and its Early Modern Interpretation)很有意思。他以日本對兩部文學歷史經典——公元 712 年的《古事記》(712) 和公元 720 年的《日本書紀》(720) 的研究為例，提出了文學文本的本土化理解和詮釋問題，闡明了他對“經文辯讀”的理解。公元 8 世紀的日本列島是古典中國文化的跨地區東亞領域，有兩部重要的歷史地理學文本非常值得注意，一是《古事記》，一是《日本書紀》。《古事記》和《日本書紀》均由中文漢字撰寫，後者與中國古代歷史的記述相符，而前者卻因經歷各種詮釋而顯得是中日兩種文化的混雜，它所記載的歷史景象與後者有著明顯的差異，而這樣的詮釋出於一定的政治目的，以顯示詮釋者的政治權威，以至於在隨後的日本文學史中，《古事記》的地位遠遠超過《日本書紀》。德盛誠教授認為，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與十八世紀的一位日本學者本居宣長(1730-1801)對《古事記》的解釋與推崇有關，而且，這種解釋與推崇還為大量現代日本學者所接受，以至於在 1890 年《日本民族文學歷史》出版時，《古事記》被放在了第一篇，而《日本書紀》被完全排除到了書外。德盛誠教授批評說，本居宣長的詮釋框架受到了政治、歷史和文化的多種侷限，在今天我們越來越多地意識到這種侷限的時候，我們應該借鑑“經文辯讀”的方法，就本居宣長對文本的分析進行語境化研究，以真正獲得文化融合語境中的文本本土化詮釋。

黎子鵬教授帶給本次會議的論文題目是《〈聖經〉中的虛構性再現：中國 19 世紀的基督教小說》(Fiction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Bible: Chinese Christian Novels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論文詳細列舉並歸類了 19 世紀中國基督教小說，涵蓋了傳教士作品、基督

徒作品、翻譯作品和基督教文化與中國文化結合後的原創作品。黎子鵬教授認為，這些作品創造性地利用了中國傳統文學的形式，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充分表達了基督教思想或重述了《聖經》故事。對這類作品的深入研究，可以為理解 and 解釋今天流行的基督教文學作品提供很好的參照，也可以對建立“經文辯讀”和比較文學研究的關係起到推動作用。

劉耘華教授的論文《如何建立中國文化的“解釋性建構”：郝大維與安樂哲對中國古典文化的解釋原則》介紹了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在美國學術界小有名氣的兩位學者郝大維（David Hall, 1937-2001）和安樂哲（Roger T. Ames, 1947-）。郝大維儘管沒有學習漢語的經歷，但他的哲學推動了中國與西方文化的交流。從 1980 年代起，郝大維與漢學家安樂哲合寫了一系列著作，這些著作當恰如其分的表達了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融合與交融，也包含著豐富的文化比較方法論資源。他們認為當代文化現象是可以恰當詮釋的，因為文化根植於歷史當中。他們的觀點不像馬克斯·韋伯（Max Weber）、雅斯貝爾斯、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ens）和懷特海（Alfred N. Whitehead）那樣簡單地把西方文化的原型追溯到公元 5 世紀的西方文明，或追溯到聖奧古斯丁。他們建立了自己的“解釋性建構”（interpretive construct）並將之用於詮釋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認為中國文化的解釋性建構建立於先秦和兩漢時期。郝大維和安樂哲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開展了跨文化比較研究。劉耘華教授的論文在讚賞郝大維和安樂哲的學術成就的同時，也指出了其“解釋性建構”學說的幾點不足。

張輝教授的論文《經書還是民謠：〈詩經〉的跨文化解釋及其詮釋學影響》運用“經文辯讀”原則分析了中國古代經典重要文本之一的《詩經》在當地中國學界的命運。在現代以前，《詩經》一直被視作非常重要的儒家經典，然而，在深受西方美學和文論影響的當代文學和思想界，《詩經》已經喪失了其經典位置。越來越多

的中國學者僅僅將《詩經》主要視作早期中國民間詩歌甚至歌謠的總匯，在引用、解釋和翻譯時很少參照古代注疏。令人吃驚的是，來自西方的《詩經》翻譯者如理雅各（James Legge）、阿連壁（Clement F. R. Allen）和亞瑟·韋利（Arthur Waley）等具有基督教背景的學者卻走出一條相反的路徑：他們竭盡所能遵守儒家的詮釋傳統，將《詩經》尊為儒家經典之一，並盡可能運用古代中國的注疏評論來解釋和翻譯《詩經》。張輝教授希望他的論文可以為當今的“經文辯讀”運動提供參考。

張華教授在其論文《〈論語〉與〈古蘭經〉的經文辯讀》中也實踐了“經文辯讀”原則。他指出，在進行這兩個文本的“經文辯讀之前”必須首先消除兩個誤區：一是認為《論語》不屬於神聖經典所以不屬於“經文”的誤區；二是認為《古蘭經》是穆斯林真主安拉的語言，由先知默罕默德用阿拉伯語記錄，普通人是不能“辯讀”甚至不允許翻譯的。事實上，無論是儒家文化圈，還是穆斯林世界，對《論語》和《古蘭經》進行的“經文辯讀”從來也沒有停止過，而且都打上了各自文化特徵的鮮明烙印。張華教授認為，當下的世界是一個全球化的世界，當今的時代也是一個多元化的時代。在地球“變得”越來越小的時候，人類的聯繫也變得空前的緊密。在人類不斷的交往活動中，不同文明系統的交流、對話也逐漸深入下去。上個世紀西方提出“文明衝突”的理論時，作為世界上有著悠久歷史的古老文明，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卻用實際行動回應了這一錯誤的觀點。在中國，儒家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對話已經持續數年，並成為了“文明對話”的典範，可以為促進世界其他文明間相互對話做出貢獻。

圓桌會議的議程只有短暫的一天半時間，但學者們的討論和研究還在繼續和深入。正如楊慧林教授在大會閉幕式上的總結所言，本次圓桌會議旨在比較文學與宗教研究的交叉縫隙中探索“經文辯讀”，利用中國資源突破“經文辯讀”的傳統框架和範疇，也因此

深化了比較文學的跨文化、跨語言和跨學科疆域，進一步擴展了國際比較文學協會的研究領域。